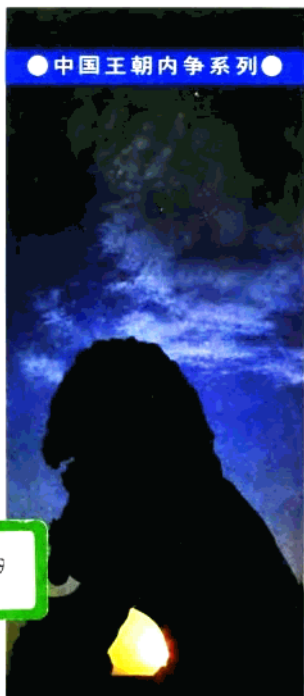


王 若 编 著

辅臣倾轧

相位之斗

● 中国王朝内争系列 ●



出版者的话

历史是人类知识、智慧的积累，是先辈留给后代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，故言曰“读史使人明智”。不过，在生活快节奏的今天，要读一部煌煌历史巨著，对许多人来说，不下非常的决心，恐难静心卒读。即便下定决心，恐怕是纵有开头，亦难有结尾。鉴于此，我们规划出版了“中国王朝内争系列”。

我们这套书的出版，试图走出一条新路，即高雅的学问通俗去作。我们觉得，在学术界有一种不成文的清规戒律，学术高居文雅的殿堂，傲守高不可攀、曲高和寡的自尊，以理性、冷峻为美。这种清高和自尊，我们是很钦佩的。但是，思想和知识，是需要传播的，只有让更多的人了解并掌握，一代传一代，思想才能成为不朽，知识才能成为永恒。所以我们请专家学者，走下殿堂，靠近民众，在雅和俗之间架起一座桥梁。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俗，不是低俗，不是粗俗，更不是媚俗，而是请学有专长的学者，把他们的学术成果、学术观点，用清新雅丽的语言、闪烁着思想火花的华采辞章，用读者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，再现历史，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，并以史为鉴。

历史是异彩纷呈的，是博大精深的。我们涉足历史，并

不能因这几本小书，就希望越过历史的每一条河流。经反复论证，征求学者的意见，决定围绕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展开论述。首推《血溅龙袍——皇位之夺》、《宫闱风波——宠位之哄》、《辅臣倾轧——相位之斗》、《群雄逐鹿——割据之战》、《朋党误国——帮派之乱》、《忠奸分庭——善恶之辨》、《新旧浮现——变法之争》、《文网血泪——文字之祸》。从八个方面，系统地研究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，再现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的复杂性、多面性，手段和方法的残酷性和阴险性。他们有的为了国家大业，忍辱负重，矢志不二；有的身不由己，莫名其妙地成为牺牲品；有的为了一个权字，朋友可以反目，兄弟可以成仇，甚至刀剑相加，同室操戈。当然历史是复杂的、矛盾的，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，不能以简单的善恶来做终极评判，也不能因其手段的残忍和卑劣，而否定其对历史发展的促进作用；反过来，也不能因其有益于社会，而赞成其手段的残忍和卑劣，而应该历史地、客观地评判。总之，经过作者独具匠心的条分缕析，一条是非、善恶的脉络，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。读者不仅可以从中追览历史的风风雨雨，而且可以了解史学家的观点和其对历史的客观评价；不仅可以追睹历史上惊心动魄的厮杀，而且可以掩卷沉思，得到历史的启迪。

不过，这八本书的表现形式，仅是一种尝试，还有很多不尽人意处，比如体例、写法上，因作者不同，差异是难免的。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期待着读者朋友的认可和诚恳的批评、指正。

出版者

1996年1月

前 言

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，宰相是封建官僚政治的代表。相位之争斗，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，各种矛盾斗争的总体现。因此通过对相位争斗的探索，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封建统治集团中，君臣之间、各级官员之间错综复杂的权利角逐的特点和规律。

宰相是中国封建时代辅佐君主管理国家事务的最高行政长官。处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其地位之显赫，权力之巨大，人们曾用“位极人臣”来形容。可以说是封建官僚政治矛盾斗争的焦点。

宰相由皇帝任免，但也并不是一朝上任便可终身为相。它既不能世袭，也不是终身之职，一般士大夫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争取。当宰相的条件一是品德和才学，二是皇帝的信任。因此，封建时代的下级官僚，都把出将入相作为自己终身奋斗的目标。王夫之总结说：“宰相之重，仕宦之止境也，苟资望之可为，皆垂涎而思得。”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有做宰相的“资望”，千方百计想得到相位。由于官位有限，而欲得到它的人多，那么权力斗争便不可避免。更由于相位是人臣的最

高权位，能够参加相位争斗的人，不仅已经具备了很高的权力和地位，而且也有着相当的势力，因此相位争斗较之一般的官僚斗争更激烈、更复杂、更残酷。综观中国封建历史，围绕着相位争斗，不仅交织着阴谋，而且伴随着血腥。

（一）宦官争夺相位。秦始皇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封建专制国家后，注重起用人才，因此很多原本地位低下的布衣，便有机会担当国家要职，也给野心家争权提供了条件。赵高本来是宦官，秦始皇听说他干练有才，精通狱法，便提拔他做了中车府令，专管皇帝的车舆。条件的改变，使他萌发了争夺大权的野心。他私下里勾结公子胡亥，以便做自己争权的靠山。秦始皇最后一次巡游天下时，不幸病逝沙丘，他私自扣押了始皇临终要长子扶苏继承皇位的诏书，拥立胡亥篡位，是为秦二世。由于他的策划和拥立之功，被封为郎中令，位居九卿。赵高为了保住自己既有的地位，便唆使秦二世大兴冤狱，杀死朝中很多功名显赫的大臣，甚至连秦始皇的十二位公子、十位公主都遭到了残害，受株连的人不可胜数。这样便为他继续争夺相权打下了基础、铺平了道路。接着，赵高又施展阴谋，要二世深居宫中，自己和几个亲信侍候在二世身边，使他不理朝政，一切大权皆控制在赵高手中，甚至连丞相李斯也见不到秦二世。接着，赵高又采用卑鄙手段陷害李斯，将其腰斩，并诛灭三族。李斯死后，朝中便完全由他掌握，逼死右丞相冯去疾之后，秦二世便任命他当了宰相。

宦官身处宫中，围绕在皇帝身边，对朝中情况了如指掌，这给他们争权带来了方便条件。因此在封建社会中，宦官专权的事情屡有发生。加上这些人生理上的缺陷，心理趋于变态，因此在权争中手段极其残忍。

唐朝宦官李辅国，十几岁便被阉割，送到宫中养马院。由

于他机警圆滑，办事认真，40岁时混上了养马院中管帐的差事。后又被推荐到太子李亨宫中听差。李辅国非常懂得如何讨好太子，取得太子的信任。恰好此时发生了安禄山兵变，唐玄宗带着太子及部分嫔妃出逃，李辅国不分昼夜紧随太子，表现得无限忠诚。尤其他知道太子痛恨杨国忠，在马嵬驿士兵哗变杀杨国忠时，便积极参与，深受太子的器重。在逃跑途中，李辅国分析了当时混乱的形势，便劝太子北上，并同大臣裴冕等人联名上书，奉劝太子登帝位。虽然太子左右推辞，但最后还是在灵武即位，是为肃宗。由于他的劝驾之功，肃宗当然把他视为心腹，任其为判元帥府行军司马，并且掌管起御前符印、军队号令和各地来的文件奏章等等，从此掌握了朝中的军政实权。

掌握了一定的权力之后，李辅国同其他人一样，野心大发，开始勾结同党、排斥异己，为自己独揽大权铺路。他首先勾结肃宗所宠爱的张良娣，与她互相利用，阴谋害死了肃宗的长子李俶和三子李偁。因为他们不仅是张良娣儿子成为太子的障碍，也是李辅国独揽朝政的劲敌。建宁王李倓对李辅国的所作所为早有察觉，便多次劝肃宗不要相信他。李辅国担心肃宗被说服，便千方百计陷害他。

回到长安之后，李辅国升任殿中监。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，他利用已有的权力和肃宗的信任，到处安插自己的耳目，打击排斥异己。最后竟逼迫宰相裴冕，要他与大臣们联络，上书推荐他当宰相，真有些急不可待了。后来在肃宗临死时，李辅国计杀越王李系，囚禁张皇后，拥立太子李豫登基，夺取了宰相的宝座。

宦官当宰相，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并不多见，他们取得宰相职位都是靠皇帝的权势。赵高也好，李辅国也好，他们之

所以能够夺得相位的一个共同特点，都是先靠扶持太子，或帮助所扶持的王子篡夺太子位，然后拥立太子登上皇位，利用皇帝的权利控制朝中，独揽大权，排斥打击异己，然后夺取宰相宝座。宦官当宰相，表现了当朝制度的混乱，和皇权的削弱。综观中国封建社会史，凡是宦官当权的朝代，那个朝代的皇帝肯定无所作为，社会必然动乱不安。

(二)朋党与相位争斗。相位争斗不是孤立产生的，在封建官僚集团中，不同的利益集团围绕着相位展开角逐，宰相只是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。因此在相位争斗中，往往表现为朋党之间的对抗。他们拉山头搞派性，对异己者进行打击排斥。唐代的牛、李党争表现得尤为突出。

牛、李两党的形成，是权利斗争的结果。唐朝的开科取士，打破了士族垄断朝政的政治局面，一些地位低下的寒士可以有机会通过进士及第进入朝中做官。唐宪宗时，牛僧孺、李宗闵同年考中进士，又同登制科。他们意气相投，指斥时政，对当时宰相李吉甫进行了抨击。后来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攻击李宗闵科场舞弊，并同郑覃一起主张罢止科举考试，朝中要职应由公卿子弟担任，企图回复门阀制度。牛僧孺则坚决反对公卿子弟垄断朝政，他们各自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利益，于是便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利益集团。他们为了争权夺利，互相排挤，势不两立，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。李德裕为宰相时，欲置牛僧孺和李宗闵于死地，派人搜寻其谋反的证据，以陷害之。牛党执政后，又对李党进行残酷报复，罗织李德裕的罪名，最后终于将其整死。他们甚至不能同朝相处，一党上台，必定利用相权打击对方。两党根据不同政治形势的变化，交替执政，轮流外任。虽然他们两党都各自不同地为朝中作过贡献，但他们所搞的历时长久的党争，也给唐朝带来

了极大的危害。

朋党的另一种形式是攀附党首，互相勾结，彼此援引，为争权夺利互相利用。宋代奸相蔡京，史书上称其为“六贼”之首，他与童贯、王黼、梁师成、李彦、朱勔结为朋党，祸乱朝廷。他们结党的目的十分明确，就是结党营私。与牛李党争不同的是，牛李二党阵线分明，而蔡京为首的“六贼”奸党，是与朝中所有正直大臣为仇。最初蔡京因坑害同僚、投机取巧，已经爬到了龙图阁直学士的位置，后被贬到杭州闲居，偶然遇到了在杭州为宋徽宗购买字画的宦官童贯，于是互相交结，靠童贯的力量得以登上相位。接着利用权势将地痞朱勔安插到苏杭应奉局任职，又收买专善投机钻营的王黼，将其提拔为御史中丞。宦官梁师成见他们在朝中得势，于是也投靠了他们，蔡京将其荐为太尉。李彦出身于市井无赖，也逢臭而来，围绕在蔡京周围。他们朋比为奸，凡是不为其所用的正直朝臣，一概加以打击排斥。为了达到独揽相权的目的，把司马光等 120 多位大臣定为“奸党”，并在皇宫门前立所谓“奸党碑”。凡是碑上有名的大臣，不仅本人不得复用，就连其子孙也不得起用。前任宰相章惇与蔡京是同乡，蔡京怕其复相，便将其打入“奸党”。“六贼”专擅朝政，使北宋政权吏治腐败，朝纲紊乱，最终断送了北宋政权。

相位争斗与朋党政治是相辅产生的，宰相一旦执政，必然要选任一批能够支持自己施政的朝臣，而宰相往往在一朝中有几个，他们各自都拥有自己的拥护者。那么宰相之间的矛盾，便是他们拥护者互相斗争的根源。如果宰相之间互相争权夺利，那么他们的拥护者也就成了对方打击的对象。因此说相位争斗与朋党之争是密不可分的，也就是说，相位争斗必然会牵扯朝中各派政治势力。有相位之争，也就有朋党

之争，也就会有朝中大规模的政治斗争。这种斗争在封建统治集团中从未间断过，只是有时激烈一些有时平缓一些罢了。由于相位争斗引出的朋党政治，使国家机器难以正常运转，甚至会危及封建帝国的存在，因此在一些朝代中，封建君主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加以制止，但收效甚微。

二

相位争斗的另一种集中表现，是围绕着改革展开的。

改革是统治集团运用国家机器解决社会政治、经济问题的一种手段，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。倡导改革的政治家，往往是具有一定政治远见的当朝宰相。然而反对改革的旧势力，在朝中依然十分强大。有时候改革家与反改革者同朝为相，他们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，因而斗争更加复杂，更加尖锐，涉及的范围也更大。围绕宋代王安石变法和明代张居正变法所展开的斗争，可以充分反映出其斗争之激烈。

变法改革必然要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，因此，既得利益者当然会不顾一切地进行反对。尤其既得利益者多是当朝权贵，他们有着庞大的社会势力。而改革者往往是新兴力量的代表，新与旧的较量也一定是殊死的。当宋神宗将改革派代表王安石召到京师，准备任他参知政事（副相）领导改革时，那些墨守旧章的官僚士大夫们，便对他产生了嫉恨和敌视。唐介首先表示反对，说：“若使王安石为参政，恐多所变更，必扰天下。”韩琦也说：“安石做翰林学士有余，当执政官则不行。”吕海更是捏造了王安石十大罪状，对其大加诽谤诋毁。一句话，就是阻止他任副相，以便把他变法的计划扼杀掉。

由于宋神宗的支持，终于力排众议，使改革变法得以进

行。反变法派便利用各种手段进行破坏，他们甚至利用天象的变化大做文章。当时华山发生了山崩，文彦博竟对神宗说：“市易司不当差官自卖果实，致华山山崩。”真是无稽之谈。王安石当即上书反驳：“天文之变无穷，人事之变无已，上下误会，或远或近，岂无偶合？此其不足信也。”但是在那科学不发达的时代里，神宗使对变法产生了怀疑。由于新法的施行，直接由市易司向宫廷和官衙供应所需物品，致使那些以往在购买宫中用品大占便宜的官员一下子无利可图了，他们便大造谣言，反对新法。神宗的岳父向绦，也因为免行钱的实施，而无法从中渔利，便把市面上的各种谣言带到宫中，在宫中掀起了一次反变法的高潮。他们甚至动员太后向神宗施加压力：“安石乱天下，怎么办呢？”面对反对派强大的攻势，王安石毅然进行反击，他提出了著名的“三不足”：“天变不足畏，祖宗之法不足守，人言不足恤。”但是反对派采用了各种手段对王安石变法集团成员进行围攻、迫害，乃至分化瓦解，王安石最终二次罢相，使变法最终失败。

明代张居正的改革也是如此。虽然他的改革没有触犯封建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，但确实触动了一批官僚的既得利益，于是他们便群起而攻之，公开起来与之对抗，一时间也是风波迭起。刘台本是张居正的学生，此时也弹劾老师“威福自己，目无朝廷祖宗之法”。甚至指责张居正结党营私，贪污受贿，并要求神宗“抑损相权，毋使事误国，臣死且不朽”。根本目的就是要把张居正从宰相的位置赶下台。可以说变法改革与反对派的斗争，是新旧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，其主要表现是相位之争。因为作为改革家的宰相，他是靠宰相权力的实施来调动国家机器进行改革的，反对派阻止改革，首先就是要把他从相位上拉下来。正当张居正准备把改革向纵深发

展的时候，其父在江陵病逝。按照当时的制度，张居正应提出辞职守丧的请求。如果其子在军队任职，并恰好处于战争，皇帝可下诏特批继续任职，这叫“夺情”。而张居正不在军队任职，所以不能“夺情”。但改革正处在重要关头，张居正一旦离职，则一切都付诸东流。在户部侍郎李幼孜的请求下，神宗要张居正“夺情”，在京城守丧47天，期满即入署办公。

“夺情”的诏书一下，引出了轩然大波，朝野上下议论纷纷。一些以维护名教为借口的士大夫指责他“热中权势而不守礼义”。不少人上书反对夺情。他们质问张居正：“位极人臣，反不修匹夫常节，何以对天下后世？”请求神宗让张居正“奔丧终制，以全大节”。其目的都是要赶张居正离任，以中断改革。张居正死后，神宗废去了张居正的大部分措施，使改革最终失败。

围绕改革而起的相位争斗，是新旧两种政治势力的较量，是推动和阻拦社会进步的斗争，其影响是相当深远的。

三

相权是由君主授予的，靠它来治理国家。但是为了防止宰相手中的权力过大，致使大权旁落，给宰相篡位以机会，封建君主总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对相权加以限制。结果导致了历代宰相制度、名称、权限的不稳定。当授予某部门权力时，必定用以制约前一权力部门的权限，同时加上一个新的名称，规定其权限范围。

秦朝统一中国后，在新的官僚机构中，皇帝是最高统治者，下设丞相、太尉、御史大夫，以丞相为百官之首，辅佐皇帝，总揽朝政，权力极大。《史记·陈丞相世家》中说：“宰相者，上佐天子理阴阳，顺四时，下育万物之宜，外镇抚

四夷诸侯，内亲附百姓，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。”

到了隋唐时期，实行新的宰相制度，以尚书、门下、内史三省首脑为宰相。三省并立，互相制约。由内史拟旨，门下审核，尚书执行。尤其唐代，皇帝为了限制三省权限，还常常挑一些品级低的官员，加上“同中书门下三品”、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”等名称，使其担当宰相职务。为了分散宰相的权力，唐代还设有枢密使。欧阳修《归田录》中记载：“枢密使，唐制以内臣为之，故常与内诸司使、副为伍。自后唐庄宗用郭崇韬，与宰相分秉朝政，文事出中书，武事出枢密。自此之后，其权渐盛。”宋代初期官职承唐制，宋太祖赵匡胤，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，设三个参知政事为副职。神宗五年又加以改革，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，并以尚书左右丞代替参知政事为副相。到了明代，太祖朱元璋废除了相承已久的宰相制。朱元璋为了加重自己的权力，洪武十三年除掉了胡惟庸等几位曾任宰相的人后，下令取消了这一职位。他把大权收归皇室，自己亲自掌握。把朝中的实际政务交由六部分掌。朱元璋声明：“自古三公论道，六卿分职，不闻设立丞相。自秦始置丞相，不旋踵而亡。汉、唐、宋虽有贤相，然其间亦多小人，专权乱政。今我朝罢丞相，设五府、六部、都察院、通政司等衙门，分理天下庶务，彼此颉颃，不敢相压，大权一归朝廷。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，臣下敢以此请者，置之重典。”清代的官制秉承明制，没有太大变化。我们从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制这一举措中，基本上可以了解君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。

明初朱元璋设宰相两个，李善长为左相，右相由徐达担任。李善长多谋善断，在朱元璋夺取政权的战争中，立下了卓越的功勋。军事上、经济上等等大小法规制度几乎都

是由李善长组织制定的。明朝建立之后，李善长没有改变以往的工作方式，尤其身居相位，很多事情就显得有点自作主张，甚至有些独断专行了。渐渐朱元璋的帝权与相权的冲突便出现了。朱元璋对这位开国功臣也不好使用强压的手段，只好一忍再忍，最后好不容易得到一个机会，让他致仕回家。此时，朱元璋已感到相权太大，弄不好对帝权是个威胁。但是他此时还仅仅认为是李善长个人的情况所致。他是否觉得自己功高盖世，骄傲自肆？如果换个谦恭稳重的人，就不会出现那些情况。也就是说，问题不是出在丞相这个职位上。因此，当徐达、李善长都致仕后，朱元璋仍保留丞相一职，并任原帅府旧臣汪广洋担任。这汪广洋善揣帝旨，工作极为小心，但能力太差，无所建树，使朱元璋大感失望。致仕在家的李善长为了能对朝中施加影响，便趁机推荐自己的亲信胡惟庸进入中书省，结果也被任为右相。

胡惟庸为人精明干练，上任不久便把中书省大事小情弄得井井有条。朱元璋感到汪广洋实在不称职，便将他外放到广东。其实胡惟庸在入相前就与李善长密谋，要把汪广洋挤出中书省。因此，在李善长的策划下，胡惟庸才得以把事情办得干净利索，让朱元璋非常满意。汪广洋离开后，朱元璋才发现胡惟庸与李善长沆气勾结，此人机诈善变，唯利是图，而且独断专行。使朱元璋十分后悔的是，不该把汪广洋赶走。朱元璋也是工于心计之人，他为了利用而又能控制胡惟庸，便采取了一个措施，将胡惟庸升为左相，又从广东调回汪广洋为右相。朱元璋调他回来的目的十分明确，就是让他牵制胡惟庸，一方面作为自己的耳目，另一方面分散他的权力。但汪广洋是个树叶掉下来怕打破头的人，根本没有起到这作用。朱元璋非常生气，便准备把宰相制度废掉，于是便千方百计

找寻左相胡惟庸的罪证，否则也不好轻易把相传了多少代的制度废掉。终于有御史中丞弹劾胡惟庸结党谋反，朱元璋便迅速处理，马上命有关方面审理，即刻处决。随着胡惟庸的死，中书省同时被撤消，宰相制度在明洪武十三年被废除。

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后，中书省的政事悉归六部，使中央各权力部门互不统属，大权统归皇帝。为了解决拟旨、定制、批示等工作问题，便用一些在内廷工作的学士、讲官，以及翰林院中修史人员帮助。开始时没有定编，也不定职，直到明永乐皇帝登极后，才将处理这些文书的人予以定员，也给了定称，这就是“阁臣”。明代的“阁臣”虽然类似于“宰相”，但权力却比宰相小多了。这也正是朱元璋限制相权最成功的地方。

四

相位争斗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课题，我们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，去研究它。无论争夺相位，宰相之间及与官僚们的争权夺利，还是帝权与相权的互相角逐，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，因此不能简单地分善恶美丑。还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，人的思想、行为可能都会发生变化，有的人可能从邪恶归于正途，也有的由君子变成小人。如宋代奸相秦桧，最初也是位饱学之士，进士及第后又中词学兼茂科，也想有所作为。当靖康元年金兵攻打汴京，朝廷主和派向金兵乞和，金兵要求宋朝割让三镇时，秦桧立即上《兵机四事》疏，反对割让三镇，当他的四条意见被主和派大臣张邦昌压下，他愤然以辞职相抗，尤其又与何栗(li)等大臣积极主张抗战，应该说是具有民族气节的。但后来他竟背叛了祖国，成了杀害岳飞的凶手。可以说他是一个由

君子变成小人的人。但是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巨大的变化呢？是被逼、被利诱，还是另有原因？可以进行专门研究。但有人说他一开始就是混蛋，假装主战，这就未免太主观。

也有的历史人物大节可以说是不亏，有的甚至对历史的进步起了一定作用。但是同时，他们也搞任人唯亲、结党营私，乃至贪污纳贿那些东西。如王安石是宋熙宁年间变法派领袖，他身任宰相，却毫无顾忌地利用手中的权力，将自己的儿子、亲家安排到朝中机要部门。甚至那些逢迎谄媚之徒，拍马溜须之輩也受到重用。正如司马光所说的：王安石“汲引亲党，盘踞要津，挤排异己，占固权宠”。变法期间，王安石的重要助手吕惠卿，也利用自己副相的地位巧取豪夺，他同地方官相勾结，向富户“借”了四千多贯钱，在苏州购买了大片田产。同是变法首领的章惇，也利用职权在风光秀丽之处建立别墅，购置田产。即使是改革派的总指挥王安石，也在江宁“求田问舍”，利用改革变法之机，大发个人之财。再如明代万历年间著名改革家，有“救时宰相”美誉的张居正，在改革开始时，为官清正廉明，整饬吏治，唯才是举。但是到了改革取得成效之后，便对反对过自己的人大打出手，严加排斥，结成张氏小集团。同时也开始居功自傲，喜听阿谀奉承话。礼部侍郎邱岳写了一副对联：“日月并明，万国仰大明天子；丘山为岳，四方颂太岳相公。”张居正喜不自胜，准备对其越级提拔，后因有病才未实现。身为宰相，甚至带头科场作弊，大坏科场风纪。在其为相其间，大肆接收请托贿赂，甚至贪污纳私。张居正后来被抄家时，抄出黄金一万两，白金十几万两，还有大量的珠宝玉器。虽然他自己不承认贪污受贿，但事实是否定不掉的。如果单从这一点去看，这与严嵩和清代的和珅又有什么区别呢？

也有的人奋斗的目标无可指责，但是所用的手段却是十分卑劣的。如发动“甘露之变”的唐代宰相李训，鉴于宦官势力对唐朝的祸乱，以铲除宦官势力为己任，为达到自己的目的，他主动投谒攀结大宦官王守澄的亲信郑注，以作为自己进身的阶梯。果然他得到了当朝皇帝文宗的宠信。为了达到可以与宦官势力较量的宰相位置，他同样又利用宦官的势力首先打败了以李德裕为首的政治集团“李党”。接着，又采用了卑劣的手段，击垮了李宗闵、牛僧孺的牛党。接着又对朝中一些大臣，进行了残酷打击，为自己争夺相位铺平了道路。虽然他终于当上了宰相，但是却遭到了人们的鄙视。等等。

总之，在相位争斗中，人们以各种面目出现在历史舞台上，我们对之应加以认真地分析。今天，我们从封建时代统治阶级内部众多的权争中，选取十几次有代表性的权力角逐，编成《辅臣倾轧——相位之斗》这本小册子，以便广大读者对封建时代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有一个初步了解，认识其斗争的实质，从而加深对中国封建时代专制主义政治的了解和认识，掌握其内部斗争的特点和规律。

作 者

1995年8月于大连

目 录

编者的话	1-2
前 言	1-13
囤积奇货，只为窃国	1

小盗窃珠，大盗窃国。战国末年吕不韦，以千金之资，预购秦之相国，引出千古奇谈。

赵高篡权，祸灭秦朝	16
-----------------	----

弄权术者最终被权术所杀，这似乎早已成为历史的定律。无论你有多大智慧、多大贡献，只要受到权术的诱惑，最终都是在劫难逃。秦王朝时的赵高、李斯，均未逃脱。

亦奸亦雄，千古评说	31
-----------------	----

乱世宰相曹操，有雄才大略，亦不乏小人之计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逐鹿中原，三分天下，汉室不再复。

太监宰相，欺君压臣	46
-----------------	----

太监本是大内奴才，皇家走狗，狗仗人势是太监专权的一个通例。然而事有例外，唐朝太监李辅国却是仗